内源发展视角下扶贫工作中农村社区能力建设的探析

张冬梅[[1]](#endnote-0) [[2]](#footnote-0)

（云南大学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云南昆明 650091）

摘要：农村的发展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寻找良好可持续的农村发展战略也是迫切的任务。内源发展观的提出，将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焦点，集中到了人的主体性在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上，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反贫困行动提供了重要的哲学理念。内源性发展作为一种发展战略、行动战略和新兴的发展范式，在扶贫工作中具有推动可持续脱贫的作用。内源性扶贫和外源性扶贫是相对应的概念范畴，前者是自下而上发展道路的展现，后者则为自上而下的主流扶贫模式的象征。内源性视角下，任何发展目标的完成必须立足于地方参与，从而产生一种推动地区发展内在动力，并提供一种使发展本质上与地方意愿相一致的、可持续的扶贫机制。文章尝试在内源发展视角下对农村社区及村民个体的能力建设策略进行探析，寻求通过提升农村社区的参与能力和村民自主性、主体性促进自身的发展。

关键词：农村发展；内源性发展；外源性扶贫；农村社区能力建设

1. 问题提出

近年来，内源性发展方法在西方农村发展政策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西方农村的发展理念重点也从外在因素的关注到内生因素的关注转变[[[3]](#endnote-1)]。内源发展对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理论的反思和批判，以发展中国家本土化的发展探索为主要旨归，直接开启了内生或内源性发展理论与模式的门径[[[4]](#endnote-2)]。在中国，反贫困长期以来都是国家发展预的核心领域，反贫困是我国的主要议题。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政府农村实施了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程，在粗放扶贫到精准扶贫的转变中，虽然脱贫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多年的扶贫实践主要为外源性扶贫[[[5]](#endnote-3)]。而面临着当前农村致贫原因多样、贫困类型复杂的严峻形势,脱贫攻坚任务仍然繁重，显著成效的背后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且帮扶工作存在着许多盲点。存在农村社区资源被忽视，利用度不高，对外来资源依赖强，民众的自我身份认同感低、参与能力弱、行动力度低、内生动力不足等困境。

20 世纪 70 、80 年代以后，发展研究逐渐走入低谷 ，各种理念对既有发展话语的解构，倾向及其在发展实践中对本土（内生）发展可能性探讨[2]。内源性发展作为一种发展战略、行动战略和新兴的发展范式，也渐渐地作为一个发展视角进入农村发展实践中。内源性发展与外源性扶贫是相对应的概念范畴，内源性发展助于鼓励地方民众作为行动者主体参与到发展的整个过程（方劲，2018）[1]。强调内源发展视角不是否定发展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是赋予内生因素更显著、更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很多实际证明，扶贫的难点在农村，脱贫活动开展的主要领域和重点也在农村，只有在内源发展视角下，构建个体身份的认同感，提升农村社区能力，加强农村社区的“内部”与“外部”之间的互动交流，强调“混合内源－外源动力”模式(方劲，2018:32）[3]，不断探求村民发展、农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1. 内源发展的内涵和及现实需要

在“技术—现代化 ”逻辑的外源性干预呈现出效应递减趋势的背景下， 通过内源性能力建设来促进农村社区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内源性发展强调通过发展主体的内生动力来完成自身的发展内涵和目前的以人为中心、实现可持续脱贫发展目标相契合，从而逐渐成为扶贫工作中的理想发展理念。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参与”既是发展的一种手段，也是发展的最终结果。

（一）内源性发展的内涵

亨利·明茨伯格在《发展的反思》说到：“无论对于国家还是领导者而言， 是不是已经到了内生式发展的时候了？ ”在他看来，发达国家主要是通过内生式发展实现现代化的[2]。关于内源发展的理论来源，伍兹奎兹－巴尔克罗认为主要有高度发展理论、二元增长理论、依附理论和重视区域行动和发展的区域理论等四大理论根源[1]。内源意为“在内部或从内部产生的”，它强调内部思考和创造的内部努力，强调以人为中心。内源发展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7-1982年实施的一个社会发展规划方案，旨在寻求适合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实际情况和现实需求的多元化发展过程，强调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价值观念体系和社会成员的参与动机与参与方式对发展的重要性[[[6]](#endnote-4)]。内源发展是一种尊重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人们的广泛参与并且强调该地区文化特质的发展观。内源发展视角下的农村发展应被视为在地区内和外部参与者之间的沟通、交流、协作以及人际关系互动的过程[3]。总之，内源视角下农村发展是一个多层次、多因素和多面向的概念，强调通过发展过程中地方社区的积极参与满足地方需求。利用和动员地方内部资源作为经济活动和生计发展的基础，重视理解社会、人力资源、文化等地方资源以及这些资源如何成为可持续经济活动的推动点。内源发展包含这样的观念，任何发展目标的达成和行动的发生必须立足于地方参与，从而产生一种对于地区发展的承诺，并提供一种使发展本质上与地方意愿相一致的体制。

（二）外源性发展的困局

在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为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国家对贫困进行了发展干预。从干预的主体来看，叶敬忠认为发展干预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国家的干预；二是双边或多边组织的干预[[[7]](#endnote-5)]。以精准扶贫为主的发展干预作为脱贫攻坚的主要战略，是对传统脱贫策略的超越和创新。其干预理念虽然经历了“输血”到“造血”的转变，但是整个扶贫的机制还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严格的脱贫程序。

长期以来的发展干预实践活动，还是属于外源性的干预模式，在实现持续脱贫中存在困境。首先，在这种外源性扶贫机制下，能力建设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是主要针对狭隘的的物质技术的能力建设，忽视了民众的真实需求和想法；其次外源性扶贫与需求为本相关联，需求的满足是单向无尽的，以有限的资源解决不断出现的问题；最后，在对政府公共资源的争夺中，人们宁愿放下“面子”和“人情”，被动接受中，要想得到更多“有”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承认自己的“无”，从而等、要、靠心态被强化[[[8]](#endnote-6)]，主体性和自主性被压抑。出现了“扶一把富一阵，一放手又贫困”的循环怪圈[[[9]](#endnote-7)]。

更多实践证明，这种外源性扶贫的效应递减的趋势。为了应对这个困境，发展干预模式需作出调整，不断探索内源发展视角下发展主体能力建设在促进贫困地区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1. 内源性发展中能力建设的理论思考

内源发展视角下把发展的动力和社区的能力建设和挖掘看做是重点。不是简单的仅凭外界的推动，而是更注重“内部”价值理念、反思能力、创新精神、参与能力等“软实力”的塑造过程[3]。内源发展观下的能力建设是是社区发展的实践途径和核心手段。

1. 资产文本的社区能力建设

社区是人们生活、工作的区域，也是发挥个人价值的平台。在整个社区发展模式中，主要有“需求为本”与“资产为本”两种社区发展模式。 “需求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下，面临着被动接受方为了得到更多，不断承认“无”，“等”、“要”、“靠”心态强化；“需求不明确”，心理匮乏的焦虑加强；有限资源难以解决无限问题等困境。美国西北大学的Kretzmann和McKnight教授提出“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Asset 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也称为“ABCD”理论（张和清、杨锡聪，2019：44-46）[6]。在我们的印象中，农村社区总是和“脏”、“乱”、“差”等字眼相联系，实则农村社区中拥有各种资产。其实社区中本身就存在着隐藏着“社区宝藏”自组织能力建设的积极力量。社会工作在我国大陆社区自组织 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体现在:发挥专业教育的先导作用 ,为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提供智力和人才 支撑 ;整合并善用社区资源 ,推动居民的社区参与（杨贵华、王瑞华，2010）。日本学者盐见直纪书籍《半农半X的生活》中告诉我们不要轻视农村存在的意义，它是平衡过度的城市化和消费主义的重要力量，并能为人们提供更广阔的生活选择空间，而不仅仅是社会的受助者和社会负担[6]。无论是内源发展的要求还是个人生计能力的提升，社区发展的根本在于能力的提升和培育内源动力。传统需求为本或问题为本视角下只看到农村社区“没有的半杯水”，是一种“有问题”和“有需求”的社区，必须接受外来发展干预者为其设计并推行的各种服务。而与此相反，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对缓解贫富两极化造成的社会矛盾起到重要的作用，肯定人们拥有的社区资产单有乐观还不够，更深一层的还是需要人们转变观念一起行动。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以资产为本、“以内部为焦点”和以关系为推动为三大原则[6]，对社区自主参与意识和能力的提升具有理论支持和策略支撑。

1. 文化行动模式中个体能力建设

“文化行动”是指在人们既有的想法以外，需求根植于另外一中想法的可能性[[[10]](#endnote-8)]。文化行动期待的是意识的觉醒，缔造多元化的空间，找回发展主体在发展中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吉鲁强调文化中的自我批判帮助服务对象觉察到现象背后的社会结构，通过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来提高个人的自主性和主体性。电影《黑客帝国》中说人们生活在一个高度“程序化”的社会，这种“程序”就像一个封闭的容器，容不下改变的空间，这种生活程序使人们有一种思维定式。正如我们深受问题为本的思维定式的影响，我们认为贫穷是因为落后，是资源和知识的困乏，缺乏就需要外来人力物力帮助，我们只需按照“专家”的思路去做就好[6]。内源发展强调人是发展的真正主体，以人为本也是内源发展的重要特征。在内源发展视角下强调通过发展主体的内生动力来完成自身的发展，而农村社区中村民的民众内生动力、主体性被贫困文化、不利的社会结构、固定思维等深深压抑，让穷人和资产、能力仿佛不兼容。因此个体能力建设离不开文化观念的改变，从而打开“可能性”的空间。

1. 社区能力建设的策略思考

内源发展视角下的农村社区发展把焦点放在“内部”，同时也重视外源资源的联结，探索社区中“看不见”的行动动机。基于内源发展包含任何发展目标的达成和行动的发生必须立足于地方参与的观念，农村社区及村民的能力建设中遵循每个人或社区都有潜能和资产、重视农村社区关系的建立和联结、村民是核心、重视村民关系的公众议题等原则。在这样的原则下，把社区的能力建设可分为个体自助与社区互助两方面[6]。

1. 农村社区能力建设

日本学者田源史起将中国农村社会划分为“公（政府），共（社区），私（个人、市场）”三个领域，并且他认为“共”是中国基层治理的最大资源[[[11]](#endnote-9)]。所以社区的内在资源和能力需要被重视、被激发。凡妮莎.K.罗斯在《空间、场所与人：弱势社区促进心理健康的社区发展途径》中强调把社区基础设施完善、社区参与、共同的价值、权力分享、反思性实践作为促进社区发展的方法和原则[[[12]](#endnote-10)]。罗斯把人、空间和场所”作为有助于组织社区发展活动思维和行动的框架，促进心理健康，对弱势社区的经济劣势、种族和性别问题敏感。社区能力的赋权更多体现在农村社区自组织、互助组织与平台的建设上，这个平台是公共参与的渠道，把人们聚集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在发展共同理解中阐明共同价值观的机会。除了农村社区的自然居住环境的改善还有“软基础设施”或社会文化，即村民所表达的价值、利益和场所的地位。这种软性基础设施非常像社会凝聚力的社会粘合剂，对农村社区来说，也是支持赋权。对于农村社区的资源和能力的挖掘和提升来说，关键在于社区自组织能力的建设和社区自身创造能力的培养上。主要的行动策略包括：欣赏性的评估农村社区资源，寻找社区“宝藏”，重视画农村社区资产地图，这是社区“动”起来的法宝，并且一起建构并认同本地区的历史，使社区民众对地区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发展农村社区的社会网络，包括农村社区与外在资源的联结、互助网络和邻里支持网络；发展社区经济，联结社区与外在市场，解决社区关注的公共议题等（张和清、杨锡聪，2019：51-53）[6]。当然也包括农村社区组织的发育、村民自发形成的小组团体建设等。

（二）个体能力建设的核心：赋权

赋权是社会工作实务的重要方法，被认为是帮助弱势群体的关键策略，赋权概念的背后是对社会结构的反思。弗莱雷的认为：赋权的关键要素在于“对话”，强调是通过学习、组织和行动，质疑并反抗其贫困的结构性原因（张和清、杨锡聪，2019：64-65）[6]。权力不是统治别人的权力，是协同行动中的伙伴关系的建设，是在日常互动中进行选择，通过自己的能力掌握物质及非物质性资源，以增进自我意识、尊严、幸福感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和个体的能力建设和主体性的提高息息相关。在内源发展视角下，认为任何目标的达成都立足于公共的参与。社区的参与其实和村民的参与，个人能力促进、扶持社区环境基础设施和发展软基础设施是赋权的“行动组成部分”，这个赋权行动将村民自身放在中心位置。社区参与必须让村民参与自治活动，或者与他们自身相关的、整个农村社区发展的议题，他们可以发挥优势，跨越社会障碍进行交流（凡妮莎.K.罗斯，2012），这种日常的交往可以促使村民从单独的听到说，不再成为公共领域的边缘者，使日常的交往也是赋予她们个人权利的体现，并且这个赋权活动由他们完成，例如他们住房的规划和公路的修建等。个体和整个社区的赋权，二者的关系是表与里，能力的提升也是相辅相成的。尽管由于资源分配不足或各种历史原因限制了村民公共参与能力和机会，即便如此，他们并没有在农村社区的发展公共领域中消失，他们并非是无效群体，也没有在社区公共项目中缺席，而是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甚至是“违法”的方式参与。其实农村的贫困群体拥有自己的在地知识，对村庄的风俗习惯、人文礼教知识不是社会工作者或其他扶贫行政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所能代替的，但是他们的生活智慧往往被放在了乡村发展舞台的“幕后”。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将村庄的权力关系作一场“表扬”“台前”和“幕后”，村民内生动力的培养可使村民从扶贫工作中的“幕后”到“台前”是村民对自己权能的展示，是自发行动的动力来源（张和清、杨锡聪，2019：86）[6]。在个体能力的建设中，需要重视村民个体对自身故事的讲述，创造对话的平台和空间，解释自身的现实处境，激活被遮盖的权能，这也是赋权在个体内生动力发展的主要策略。

1. 总结与反思

内源发展观的提出，为反贫困行动提供了重要的哲学理念。内源发展视角下的内源性扶贫模式也逐渐成为扶贫工作中的理想范式。内源发展强调通过发展主体的内生动力来完成自身的发展内涵和目前的以人为中心、实现可持续脱贫发展目标相契合。相比于外源性发展的内源性扶贫，其更强调农村社区和个体的能力建设、地方公众自主参与、内源潜力和地区整体性与长期性的关注。村民和社区不是外来发展干预专家意志安排下的“工具”。但是内源性社区能力建设也面临着如何处理外源性资源和内源性因素的关系、内源发展模式推广困难、经验积累不足和潜在的危害预测不足等挑战[3]。

总的来说，在以“技术—现代化”为逻辑进行外源性的发展干预模式弊端突出的背景下，内源发展视角将成为农村发展干预模式中的理想视角。社区发展的根本在于能力的提升和内源动力的激发，社区能力的建设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为进一步寻找内源发展在社区能力建设中的有效策略，使农村社区对自身的脱贫行动具有决策权、参与权和行动权，村民被压抑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得到激发还需不断的探索。

1. 参考文献 [↑](#endnote-ref-0)
2. 收稿日期：2019—11—10

   作者简介：张冬梅（1996—），女，苗族，贵州水城人，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区工作与发展型社会工作。 联系电话：15985584968；E-mail:2059941884@qq.com;

   云南大学东陆校区邮编：650091. [↑](#footnote-ref-0)
3. [] 方 劲：内源性农村发展模式:实践探索、核心特征与反思拓展[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24-25. [↑](#endnote-ref-1)
4. [] 邓万春：内生或内源性发展理论[J].学术论坛,2011年第4期，44-45. [↑](#endnote-ref-2)
5. [] 方 劲：乡村发展干预中的内源性能力建设—一项西南贫困村庄的行动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13年第4期，32. [↑](#endnote-ref-3)
6. [] 朱晓阳、谭颖：对中国“发展”和“发展干预”研究的反思[J].《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 [↑](#endnote-ref-4)
7. [] 叶敬忠：发展干预中的权力滴流误区与农民组织[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endnote-ref-5)
8. [] 张和清、杨锡聪：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理论、实务与绿耕经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0月，40-41. [↑](#endnote-ref-6)
9. [] 钱 宁：从内源发展观点看农村社区能力的建设——新农村建设中少数民族社区发展思考（节选）[J].共识，2009秋刊02. [↑](#endnote-ref-7)
10. [] 古学斌:文化、生计、妇女与农村发展：一个云南村落的实践案例[J].农村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 [↑](#endnote-ref-8)
11. [] 田原史起：《日本视野中的农村精英：关系、团结、三农政治》[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 [↑](#endnote-ref-9)
12. [] Vanessa K.Rose,Lisa M.Thompson, Space,place and people:a community development approach to mental health promotion in a disadvantaged community[J].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2012

    **An Analysis of the Capacity Building of Rural Communities i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Zhang Dongmei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Yunnan)

    **Abstract:** Rural develop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economic construction. Finding a sound and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strategy is also an urgent task.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concept focused the focus of solving social development issues on the status and role of human subjectivity in development, and provided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idea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launch anti-poverty actions.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s a development strategy, action strategy, and emerging development paradigm, plays a role in promoting sustainable poverty alleviation in poverty reduction. Endogenous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xogenous poverty alleviation are corresponding conceptual categories. The former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bottom-up development path, and the latter is a symbol of the top-down mainstream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From an endogenous perspective, the accomplishment of any development goal must be based on local participation, thereby generating an intrinsic driving force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roviding a sustainable poverty alleviation mechanism that aligns development essentially with local aspiration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capacity-building strategies of rural communities and individual villag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seeks to promote their own development by improving the participation ability of rural communities and the independence and subjectivity of villagers.

    **Keywords:** rural development; endogenous development; exogenous poverty alleviation; capacity building of rural communities [↑](#endnote-ref-10)